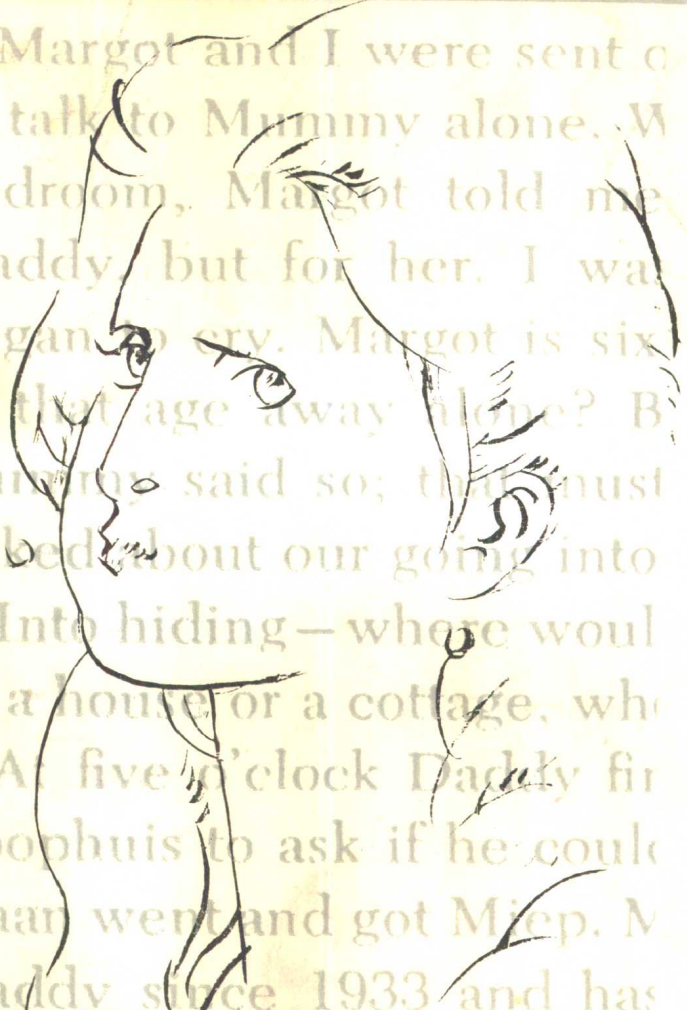


Margot and I were sent to talk to Mummy alone. In her bedroom, Margot told me that she was not going to tell Daddy, but for her, I was not to tell anyone. I began to cry. Margot is six years of that age away alone? But Mummy said so; that must be true. We must talk about our going into



Into hiding — where would we go? In a house or a cottage, where we could be safe.

At five o'clock Daddy finished his work at Koophuis to ask if he could go to Daan's house and get Miep. Miep has been with Daddy since 1933 and has been his only friend.

安娜·弗兰克日记

甘肃人民出版社

shoes, dresses, coats, underclothes, a bag, promising to return to the house; not one of us felt



安娜·弗兰克日记

〔德〕 安娜·弗兰克 著
王 汉 梁 译
黄 帆 校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安娜·弗兰克日记

[德]安娜·弗兰克 著

王汉梁 译 黄帆 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插页1 印张34/9 字数58,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789

书号：10096·321 定价：0.37元

一部独特而感人至深的作品

——《安娜·弗兰克日记》

高 年 生

《安娜·弗兰克日记》是由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写的。发表之后，震动了世界舆论，受到了各国的重视，三十多年来，这部日记一直被列为畅销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安娜·弗兰克是一个犹太小姑娘。1929年7月12日，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德籍犹太人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大肆迫害犹太人，她的一家逃亡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伴传失踪，在一座堆放货物用的阴暗的后屋里躲藏起来。除了她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娜——以外，还有凡·德安一家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犹太医生。八个人就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况下一起生活了整整两年之久。小安娜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42年7月13日是安娜十三岁生日。在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此，安娜就开始记日记。日记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小安娜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娜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学习努力，上进心很强，对一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在那不见天日、前途渺茫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来不忘记学习。她的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在这部日记里，她对周围环境和人物的生动描写以及对自己内心感受的表达深深地吸引住我们。小安娜的志愿是长大当记者和作家。如果她不是在法西斯分子的迫害下夭折的话，我们相信这个愿望是会实现的。

在那恶劣的环境里，生活必需品仅仅依赖几个好心友人的接济，外面法西斯占领者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变本加厉，后屋生活中的日常摩擦和争吵使人烦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娜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她透过厚厚的窗帘观看外面发生的一切事情，憧憬着美好的生活。1944年4月11日，安娜在日记中写道：“假如上帝让我活下去，我的成绩无疑会超过妈妈。我不会碌碌无

为。我将立足世界，为人类工作！”

就在这以后不久，即1944年8月4日，这些躲藏在黑屋子里的犹太人被法西斯分子发现了。他们被送往德国，关进集中营。1945年3月，在法西斯德国行将崩溃的前夕，安娜·弗兰克在贝尔格——贝尔森集中营里死去，死时她才只有十五岁零八个月。在罪恶滔天的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摧残下，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与此同时，她的母亲和姐姐以及凡·德安一家也都先后遭到法西斯的残害。在这一批经受集中营残酷折磨的人们当中生还的只有一个，他就是安娜的父亲弗兰克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兰克先生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家的两个好友把在后屋旧书报堆中找到的安娜日记交给了他。弗兰克考虑了很久，为了唤醒人们对法西斯兽行的回忆，不让世界千百万无辜的儿童再遭受象安娜那样的命运，他终于把这本日记发表了。

安娜的日记一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它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并且搬上舞台，拍成电影。话剧《安娜·弗兰克日记》上演时，东、西德各大城市如亚琛、杜赛尔多夫、汉堡、西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等以及奥地利的维也纳、瑞士的苏黎世等城市同时上演此剧。在法国，《安

娜·弗兰克日记》也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这出戏上演时轰动了整个巴黎。观众们从剧场出来时眼中都含着泪水，大家都为这个少女的真挚感情所感动。一位法国著名的女作家写道：“安娜·弗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的。安娜·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魂摄魄的感染力……对于那些要对这件丑事负责的人，安娜·弗兰克的日记应该引起他们痛切的内疚；对于那些曾和小牺牲者一起受苦、同样受苦和为她受苦的人，安娜·弗兰克的日记应该成为他们沉痛的回忆。安娜·弗兰克的日记具有崇高的人性，同时它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

《安娜·弗兰克日记》的原作是用荷兰文写的。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以《后屋》为题首次问世。自从那时以来，这本书便在许多国家广泛印行出版。单是在西德，《日记》的袖珍本就再版达四十余次，印数高达五百万册左右，占西德总人口数将近十分之一，今天仍被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其影响的深远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由此也可略见一斑。在荷兰本国，安娜·弗兰克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弗兰克家避难的那幢房子已被辟为安娜·弗兰克纪念馆，成为阿姆斯特丹吸引广大参观者的著名场所。

诚然，日记里有时也流露出作者的一些个人主义色彩、孤独寂寞的心情和宿命论等观点。这是与作者的年龄以及她所处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分不开的。安娜·弗兰克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熏陶，再加上在与世隔绝的后屋小天地中生活了两年之久，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对于这些地方，我们当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不可以苛求于作者的。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日记仍然是瑕不掩瑜，它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1942年

7月8日

自从星期天（7月5日）以来，似乎过去了好多年。三点钟时，有人揪了前门的门铃。我正躺在阳台上，沐浴在阳光里懒懒地读着一本书，所以没有听见铃声。不一会儿，玛格特激动地出现在厨房门口。

“党卫队^①给爸爸送来了一张传票，”她悄声说道。“妈妈看凡·德安去了。”（凡·德安是爸爸的同事。）一张传票——这对我如同是晴天霹雳；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孤寂的囚室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能眼看他落到这一步么？“他当然不能去。”玛格特断

^①党卫队，（纳粹德国）政府的特种部队，以强化纳粹统治为使命。

言道。这时候，我们一起等待着。“妈妈去跟凡·德安一家商量明天咱们究竟去不去隐蔽处。凡·德安一家要跟咱们一块儿走。这样，咱们总共就有七个人了。”房子里悄无声息。我们都不想再说什么，只是惦念着爸爸。他正在“裘特斯疗养所”（犹太人的养老院）看望几个老人，对于眼下的事态所知甚少。我们等着妈妈。燥热和不安使得我们惊悸莫名，缄口无言。

猛可地，铃声又响了。“这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边说边把我拉回来。不过，我们听见妈妈和凡·德安先生正在楼下跟哈里说话。随后，他们进来，关上了门。为了不让别人进来，每次铃响，玛格特或我都要蹑手蹑脚下去看看究竟是不是爸爸。

凡·德安想跟妈妈单独谈谈，便把玛格特和我撵出了房间。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卧室时，玛格特告诉我，传票的对象不是爸爸，而是她。我听了更加害怕，不由哭了起来。玛格特只有十六岁。他们真的要把这么个小姑娘单独带走吗？不过，谢天谢地，她不会去。妈妈是这么说的。这准是爸爸的意思，他说过我们要去隐蔽处。

到隐蔽处去——我们上哪儿呢？是城里，还是乡下，是房屋，还是茅舍？什么时候去，怎么

个去法，去哪儿呢……？

五点钟时，爸爸终于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斯先生，要他晚上来一下。凡·德安去叫迈帕。迈帕自从1933年以来就跟爸爸同事。她跟她的新婚丈夫——汉克已经成了爸爸的密友。迈帕来了。她把好些鞋子、衣服、外套、衬衣和袜子塞进她的包里带了走，并答应晚上回来。随后，房子里便沉寂了下来。谁都不想吃东西。天又热。似乎一切都很奇异。十一点钟时，迈帕和汉克·凡·赛登来了。鞋袜、书籍、衬衣再次被装进迈帕的包里和汉克的深衣袋里。十一点半时，他们又走了。我疲惫不堪。虽然我明知这是我睡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但还是倒头便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才被妈叫醒。幸好，天气不象星期日那么热。热雨哗哗地整整下了一天。我们穿上了好多衣裳，好象要到北极去似的。理由挺简单，就是想随身多带些衣服呀。象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谁都不会梦想拎着一个衣箱出门。我穿上两件衬衣，三条三角裤，一件上衣，又在外套了一条裙子，一件外套和一件夏服，此外还穿了两双袜子，一双绑带鞋，一顶帽子，一条围巾，等等。出发之前，我闷得要死。可是谁都不厌其烦。

玛格特把教科书塞进她的书包，骑上自行

车，尾随迈帕而去——对我来说，可谓不知去向。你知道，我仍然不知道我们的秘密隐蔽处在哪儿。七点半，我们走出去并关上了家门。毛苔——我的小猫咪——是跟我道别的唯一生物。她将在邻居们那儿安家落户了。这一切嘱托在一封写给古特斯密脱先生（一位房客）的信中记述甚详。在厨房里为猫留了一磅肉。早餐用的东西放在桌上。床上的被褥被拿得精光。处处都遗留着我们仓皇出逃的痕迹。我们只想逃跑，只盼望能平安地到达那儿，此外便一无所求。

7月9日

就这样，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出发了。爸爸和妈妈各拎着一只购物袋。我呢，带着一个书包。包袋里都塞满了各种各样东西。前去上班的人们都以同情的目光望着我们。你能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惋惜之情。俗艳的黄星^①已经说明了一切。

直等到我们上了路，妈妈和爸爸才向我透露了有关计划的点滴情况。几个月来，我们的许多家具什物和生活必需品已被尽量地搬运过去了。

^①黄星：纳粹分子强迫每个犹太人佩戴的一种特殊标记。

倘使我们在七月十六日迁移进隐蔽处去的话，一切都会准备得十分妥当。由于那张传票，这个计划不得不提前十天进行。所以我们的住处拾掇得还不怎么好。不过，我们会尽量把它弄好的。隐蔽处在爸爸的办公楼里，爸爸雇佣的人员不多：克赖勒先生，库菲斯先生，迈帕，还有一个名叫爱列·伏赛的二十三岁的打字员。他们都知道我们的到来。爱列的父亲——伏赛先生和两个小伙子在仓库里工作。他们不知道这件事。

现在我来描写一下这座楼房。一楼是一个大商店和仓库。楼房的大门在仓库门的旁边。进了这扇大门还有通向楼梯的第二道门。楼梯顶端另有一扇装着磨砂玻璃的门。玻璃上有“办公室”三个黑字。这是一个庞大的总办公室，里面又宽敞又明亮。爱列、迈帕和库菲斯先生白天就在那儿工作。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放着保险柜，一个衣橱和一个大食橱。从这个房间可以走进一间既小且有点暗的第二办公室。克赖勒先生和凡·德安先生通常都坐在这儿。现在却只有克赖勒先生一个人。走出克赖勒的办公室，沿着一条长长的走道，经过一只煤炉，朝上走四级台阶，便可走进这座楼房的陈列室——这儿还是个私人办公室呢。深色而庄重的家具，铺在地板上的油毡和地毯，还有收音机，精美的灯具，一切都是第一流

的。隔壁是一间宽敞的厨房，里面有热水和煤气灶。再隔壁是一间厕所。这就是二楼的情形。

一道木楼梯通向三楼。拾级而上，顶端有一方小平台，左右两边各有一门。左边一个门通向前楼的一间贮藏室和顶楼。这些很陡的荷兰楼梯，其中有一条从楼房的侧面通向一个面街的门。右边一个门，则通向我们的“秘窟”。谁也不会想到那扇粗陋的灰门^①背后居然隐藏着这么多房间。跨过门前的一级小台阶，你便可进门了。

你对着一条陡直的楼梯走去，朝左拐，一条小走道，便把你引向一个房间。这是弗兰克家的卧室兼起居室。隔壁有一个较小的房间，是他们家两位小姐的书房兼卧室。楼梯的右边，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房里有盥洗盆和一个小厕所。房里的另一个门则通向玛格特和我的房间。假如你再走上一段楼梯，然后打开一个门，你定会不胜惊讶，原来在运河边上的这么一幢旧楼房里，居然还有一个如此宽敞明亮的房间。房子里有一只煤气炉（由于它，这间房子曾被作过实验室）和一个水槽。现在那儿成了凡·德安夫妇的厨房兼卧室，还是他们的起居室、餐室和书房。

一间空小的连廊房屋，成了派特·凡·德安

^①门被以后将提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食橱掩蔽着。

的房间。此外，跟下面一层的楼梯平台一样，这儿也有一间大顶楼。你瞧，我已经把我们这个漂亮的“秘窟”统统向你介绍过了。

7月10日

我们一到那儿……迈帕赶紧把我们领进楼上的“秘窟”。她在我们进去后关上了门。这样，我们便与世隔绝了。玛格特已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的起居室和别的房间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地上、床上、到处都摊着前几个月就被带到办公楼来的纸板箱。小房间里，被褥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假如我们这天晚上想睡得象样些的话，就得卷起袖子立即动手大干。妈妈和玛格特已经动弹不得了。她们瘫倒在床垫上，显得精疲力竭，十分可怜……。但是家里的两名“清洁工”——爸爸和我——得马上动手干起来。

整整一天，我们就是打开箱盒，装填食橱，敲钉子，理东西，直到累得精疲力尽。那天夜里，我们终于睡上了干净的床铺。我们整天没有吃上一口热东西，不过，我们也不在乎。妈妈和玛格特太累了，只管关门休息。爸爸和我又忙得不可开交。星期二一早，我们继续干先一天的工作。爱列和迈帕为我们张罗来吃的。爸爸设法解决了

临时停电的照明问题。我们擦洗了厨房的地板。
这一天又忙得团团转。

7月11日

“秘窟”是个理想的隐蔽处。它朝着一边倾斜，又有点潮湿。可是在阿姆斯特丹，你绝不可能再找一个如此舒适的隐蔽所。不，说不定甚至整个荷兰都找不到呢。我们的小房间起初看上去光秃秃的。多谢爸爸事先把我的明星照像集和图画明信片带了来。我把四周墙壁布置成了一幅大画。这么一来看上去惬意多了。

玛格特和妈妈现在好了点儿。昨天，妈妈觉得精神挺好，便第一次去烧了一锅汤。可后来她去楼下说话时，把这事儿压根儿忘了。结果碗豆烧成了煤渣，粘在平底锅上怎么也不肯下来。库菲斯先生给我带来了一本“青年读物”。

我们的右邻是一家挺大的营业所。我们的左邻是一个家具工场。下班后，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尽管如此，墙壁毕竟挡不住声音。玛格特虽然患了重感冒，我们还是禁止她夜里咳嗽，并让她服了大剂量的可待因。我盼望着星期二。凡·德安要在这一天来。那时就不会这么死寂，而一定会有趣得多。使我在夜晚恐怖万分的正是这种寂

静。绝对不能涉足户外，这该多压抑啊——我简直说都说不清！此外，我又万分害怕别人会发现我们，枪毙我们。真是前途渺茫啊！大白天，我们也不得不悄悄耳语，连走路都要蹑手蹑脚，生怕仓库里的人听到。

8月14日

凡·德安于7月13日到达。早上九点半时（我们还在吃早餐呢）凡·德安的儿子——派特来了。他还不满十六岁，是个愣头愣脑、略带几分温文腼腆的小伙子，看来，对同伴并不怀太大希望。他把他的猫咪（毛雪）也带来了。半小时后，凡·德安夫妇也来了。凡·德安太太把一只挺大的便壶装在她的帽盒里带了来，引得我们捧腹大笑。她宣称：“少了我的便壶，我到哪儿都住不惯。”凡·德安先生进来时腋下夹着一张折叠式茶桌。

从他们到来那天起，我们便舒畅地同桌进餐。三天后，我们便俨然成了一个大家庭。

8月21日

眼下，我还不忙。我要一直放假到九月